

浅析陶渊明的真

李会康

(西藏民族大学文学院 陕西咸阳 712082)

摘要:陶渊明的隐逸生活使得他的人格、思想立场似乎模糊不清,致使后人对其产生不少误解。晋宋的时局异常混乱,多数文人士子生活在动荡贫苦之中,陶渊明也不例外。但在浓厚的佛老思想文化环境中,陶渊明成长的儒学氛围显得别具一格,这也决定了他的一生所为与当世迥异。但不论年少时期的四溢猛志还是因此导致的归隐后对天下的关念,都显示出陶渊明内心儒礼思想的坚定不移。陶渊明不仅作为妇孺皆知的文学家给中华文化留下了无数宝贵的文学遗产,也以其伟大的人格给困顿中的文人士子留下了不尽的精神财富。

关键词:陶渊明 真实人格 思想形成

中图分类号: I 20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4580(2016)04-0012-(07)

对于陶渊明的看法,历来纷纭不一。有人猜他神游世外“不染尘俗”^[1],有人猜他志托天下苍生“金刚怒目”^[2];有人说他是晋室死臣“耻复屈身后代”,有人说他是陶唐遗老“岂能为晋所用”^[3];有人看他有守拙之心抱朴之意“所说者庄、老”,有人看他有屈原之志梁甫之情“于夫子之志有合”。然而关于陶的议论,诸家分歧对峙的乱山丛中并不乏些许合流的溪泉:除王维对陶的仕隐行迹持怀疑甚至批评态度,大多学者对陶的印象是高洁的,不论诗家所论“陶、阮二公在典午,皆高流”(王士禛《师友诗传录三则》中引阮亭语),还是史家所评“脱颍不群,任真自得”都体现了这一点。受整个晋宋时代汹涌的佛老文化洪流影响,诸家对陶渊明的看法难免带上各自偏见。从史载陶渊明的生平经历和成长环境看,他并非完美无瑕,但整个人的真实性无可质疑。他的儒礼思想和济世信念自幼形成并日益坚定,许多申志作品的片段都直接说明了这一点。

一、植根时代的真实人格

在其所生的时代和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陶渊明都以隐士而不是诗人的身份闻名于世,平淡中寓有警策这种近似士大夫诗作的风格更使陶渊明的人格不免被怀疑有漂浮虚幻的影子。其实心忧天下的陶渊明一生闻达不久,长居困顿,并

没有近人君而忧民众的偏安庙堂之心,更多的是救民于水火的封疆之志。在大半生的田园躬耕经历中,陶渊明心怀天下的壮志从未泯灭,这使得他的归耕田园与遗世独立截然有别。陶渊明的人格是真实的,它深深植根于现实世界,闪耀着那个时代别样的光彩。

(一) 繁华落尽的诗与凌虚高蹈的人

在不少前人论述中,陶渊明常以高洁隐者身份出现,而隐者多是不问世事的,陶渊明的人格因此沾染上了一层虚幻的影子。不单陶渊明本人被沈约、令狐德棻等大家传入隐逸之列,就连他的作品也被钟嵘奉为“隐逸之词宗”^[4]。隋朝王通在《文中子·立命篇》中借旁口带出“《归去来》有避地之心焉,《五柳先生传》则几于闭关矣。”^[5]这样的观点看上去是很有可靠性的,论者似乎在陶的作品中找到了一条渐变的心路历程,并由此得证陶的最终精神归向是一个幽闭之所,远避满目离乱,安守一方心灵净土。更有甚如汪藻者,比王通所见更过一筹,以一己思为陶渊明代言,喊出“治乱兴废,是非得失,变幻万方,曰陈于前者,不足以累吾之真”^[1]的“明志之音”。陶渊明俨然驾浮云以观天下,汪藻眼中的陶渊明不再是背时而遁的隐者,更像瞰世而谈的仙人了。以这样的眼光看陶渊明,他的作品自然是

收稿日期:2016-09-25

作者简介:李会康(1992-),男,西藏民族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先秦汉魏六朝文学。

从天界降临尘俗而作“随其所见，指点成诗”（正夫），陶诗的创作成为诗人对万事万物天才的感受和天意的表达。陶渊明本人也似乎与现实脱轨，充满了凌虚高蹈的色彩。

很多学者认为陶渊明的作品中的平和纯真之气是从绮丽中脱胎处理出来的，所谓“自组丽中来，落其华芬。”显然持此说法的人认为陶渊明和与他颇有交往的颜延之心居一处，所怀皆是士大夫忧民之情，只是出于个人喜好，致使他们一人坚持富丽行繁靡之道，一人返璞归真专平淡之功。其实这些看法显然出于评论者对作家、作品的狂热迷恋，在很大程度上是主观臆测得出的结论。总览陶渊明一生所作，并无“绮縠纷披，宫徵靡曼”（《金楼子·立言》）的影子——陶诗并没有所谓蜕变的过程。在辞官归去的路途中，他毫不掩饰地对过去为杂务所驱使的生活状态进行了自我诋毁式的总结“既自以心为形役，”毫不手软地从旧日混沌状态中揭出一副萎靡的筋骨，将一个绝对真实而与华美毫无干系的自己和盘托出。晚年陶渊明面对膝下亲子时也没有要刻意树立一个高大伟岸的父亲形象：回顾自己仕而后隐的过去，不仅没有对自己的仕途生涯进行吹嘘，还对自己宦途坎坷的原因坦然道出“性刚才拙，与物多忤，”思及因早年归隐而导致的生活窘境，他据实录写并慨然叹息“使汝等幼而饥寒，”^[6]字字间对后辈的满满歉意和无限真情迫人眦眶。

陶渊明的诗并非士大夫之词，没有所谓的“华芬”部分。诗人自我回忆的诗作中对自己的露骨批评和给后辈亲子的书笺里对家人的深切歉意，都是其真诚人格的自然流露，这一真诚人格的形成也是一个真实的过程。

（二）偏安和争斗中的离乱时势 宦海和田园间的清贫生活

一个人人格的形成和所处的社会环境密不可分，陶渊明生存年代的世局，是安稳数百年的大汉王朝倾覆不久、各方雄霸争夺告一段落的暂时定格。东晋的时局是混乱异常的，从317年东晋建立到370年前秦征服大半中原的几十年中，胡汉之间争斗不断。陶出生之前东晋的偏安已经在与北地断续征伐的撼动下颠簸了48年之久。不少心怀克复神州壮志的南迁之臣如祖狄、殷浩、温桓的北伐大大鼓动了晋室北渡之志。383年由谢安、谢玄募领的晋军在淝水大败前秦军队，虽没有后继的大一统行动，但晋室已经稳稳坐定江山。然而这并没有给江南民众带来生活福音：当两谢已是旧日烟云，政局开始混乱不堪，朝野上下在司马元显父子的掌控下陷入金银滚沸，权术翻覆的局面。各方将帅更是拥兵自重，各据一方。陶

渊明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降生了。

典午大乱后门第风气依然旺盛，陶渊明的诗作提及先祖也不免时有笔涉各人官职。但到他祖父，所任官职已是不大不小，他的父亲更是很早赋闲在家，且多病早亡。陶渊明幼年长期随母亲寄居在外祖父孟嘉家中。孟嘉是当时名士，他在人格操行上对陶渊明有很大影响，陶曾为之立传，对其人格大加颂扬“清蹈衡门，则令闻孔昭；振缨公朝，则德音允集。”^[6]但孟嘉并未给陶以经济上的援助和事业上的支持，这样陶的生活就没有太多的祖德荫蔽，早年和周围不得志文士一样，读书种田。通俗说青年的陶渊明就是一名无业游走的知识分子，因为心不在农，他的躬耕生活并不安稳，与晚年归隐后“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的状况差别不大。陶渊明自陈“吾少穷，每以家弊，东游西走。”^[6]当是靠种田维持生计的读书人生活境况实录。

除去历时不久的仕宦生涯，陶的生活一直是困苦的。梁启超先生调侃地说“他不过庐山脚下位赤贫的农民”，这种赤贫生活的改变仅仅体现在“中间也还经过一两回波折”。这样的说法可能不甚切合陶的心志，但在生活状态上确是和真实状况相差不远——陶的一生不仅被压在颠簸的局势下，也为困苦的生活状态拖累不浅。长期在这种生活状态下一个人的精神也多半是孤苦的，陶渊明诗作中的平淡蕴含警策是从苦难中努力剥离出的结果，他从未以“居庙堂之高”的不切实人格去俯视时代悲剧。

（三）困顿与闻达间的济世抱负 刚烈与闲静里的归隐情结

陶的诗作《饮酒·十九》中说“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士。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在耕种难以自养和一番贫苦的游学之后，青年陶渊明开始了他入仕经历。与生活的艰苦相比，困扰陶渊明更多的该是那颗被压抑着的拳拳匡天下之心，所谓“猛志逸四海，蹇跼思远翥”，但是史载他的宦游生涯短暂得可怜，且每次出任都为时不久，对于陶渊明在职期间所为更是众说纷纭。唯一可称得上“大事”为众家公载的是彭泽辞归之时一句豪迈心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这成为陶渊明仕宦生涯的总结性发言，也成为他的辞官归田的标志性口号。似乎这呐喊声里的情绪是抱怨居多的，以至于王维对此大加诟病“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乎？”^[7]显然这是对陶渊明“猛志”的质疑和拷问。不可否认陶的宦游经历确实不长，但陶的辞归绝非如王维说，是无能于世事、“忘大守小”的行为。陶渊明的壮志因时而生，正对着离乱苍生的苦难，数次的出仕

和辞归并非因为他对现实的逃避，相反，恰是因为对现实的真切关怀和忧心才使得他做出这样的选择。

出任江州祭酒是他济世情怀的第一次流露，但这次真情因未能得到现实的支持所以虽然明确显露却行之不远。事实上陶渊明出任不久就弃职归田了，而隐退的原因，为陶作传的诸家都指出是“不堪吏职”。似乎陶渊明被迫离开涉足未深的官场是因为无能处理职位带给他的压力，或是能力不足带来的职务压力，或是位沉下僚导致的不良司属关系。从字面看祭酒、主簿不过是司仪、刀笔文书之类的小官，这就很容易让人误解陶是不堪众官僚脸色而离职的，其实这两个职务在当时应算是高官了。史书有载“祭酒分掌诸曹，兵、贼、仓、户、水、铠。”^[8]这任何一“曹”都非同小可，且陶所任为州级职务，一州之总，属于地方上级，周围并没有几个可以打压他的上司。再看主簿一职，在盛世，主簿确实是文职，做一些纸上功夫，冷淡无聊。但在陶渊明所处的时代，随着朝野日渐混乱，各地统领都坐拥一方，主簿就由画纸论书的文员转型为参议政务的谋士了，不仅统管一府之事，更是地方首脑的心腹。能得到州官的招荐做近身智囊，足以见得陶渊明从祭酒一职辞归并非因为无能于吏职事务。遇见“州招主簿”更是每个初仕之人的梦寐以求的事，陶渊明不赴吏职并非因为庸才不作或者年少心高，而是另有原因。

陶渊明晚年回顾少时壮志有“结友到临淄。稷下多谈士”、“谁言游行近，张掖至幽州”^[6]的诗句。从诗中涉及的临淄（在今山东）、张掖（在今甘肃）、幽州（在今辽宁一代）等北方重镇可以窥测到青年陶渊明心中向往的并不是偏安浑浊的江南政治深潭，而是北地胡尘下的万里河山。一份平静闲杂的美职并不能让他假装安定下来，在眼前的安定生活中，陶渊明看到的是全天下的动荡不宁。此外“闲静少言，不慕荣利”的性格也决定了他不会因为州官赋予的肥差滞留高位；“性刚才拙，与物多忤”^[6]的脾气更使得他不可能在混乱纷杂的官场徒作挣扎。他的在职不作、辞归或是赋闲不就的行为都源自他北地生灵涂炭的无法忍耐。陶渊明主动出仕的经历中镇军、参军职位更说明陶渊明有佐明主以修封疆的大志。在刘裕将军幕府内任参军本是报国良机，却终于无功卸甲，为使入京。再次补职就是彭泽令，这境况于有志难申的陶已属虎落平阳，当督邮的无耻之态凌驾身前，陶自然忍无可忍，挂印归田。陶的心中装的是天下安和，一个乱场中的督邮在他眼中当然不止是乡里之人，且是小人了。

陶渊明是真实的，不论是年少家贫的“猛志溢四海”，还是宦海浮沉里“凛气寡所谐”^[6]至于“归去来兮”，都是他发自内心的呼喊。他的整个生命都深深植根于生灵涂炭的现实世界，但并没有被混乱的仕宦争斗浸染。在两汉儒家思想揭起不久的夜幕和方兴未艾的魏晋光明世界之间，在现实宦海的偏安浊恶和内心壮志的刚烈斗争中，他被推上一条无可选择的路。隐遁田园并非遗世独立，或许陶渊明在等待另一个铁腕使君的拜谒，或许他在等一个贤明人主扭转时局，但无论如何，陶渊明都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

二、卓然世外的真纯情趣

陶渊明的归隐生活之前经历过一段猛志四溢的仕宦生涯，他归隐所为何故就成一个为众说纷纭的话题。对晋室的忠诚成为不少学者对陶渊明归隐原因的合理猜想之一，耐人寻味。晋宋之际的动荡时局的确使一些志不二仕的文士被迫遁世隐心、保身养命，但陶渊明并未选择这条道路。虽然并未入朝为郎，陶渊明仍心念黄农，保存着一颗诚挚的济世之心。故乡山水引发的家国之思、畅饮高酣催显的济世之志，都对他非同寻常的归隐情结进行了真切的诠释。

（一）念旧的前朝遗老抑或不渝的晋室死臣？

陶的归隐是不争的史实，但这使他的所为所愿似乎于情理上产生了冲突：若真心隐避乱世，在重人格的魏晋时代，他的主动出仕岂非为自己的高逸人格撒污点，若是志在天下，那么挂印归田似乎就真是一大败笔了。

陶的归隐不少学者认为是出于对晋室的忠诚。诗文大家沈约曾指出陶渊明“自以曾祖晋室宰辅，耻复屈身后代”^[8]，正因如此，他的诗作小中标注的时间，“义熙以前，则书晋室年号，自永初以来，惟云甲子而已。”后世追附这一观点的文士不乏其人，宋代的汤漠等人更以《述酒》一诗为追念竟陵王的悼词。

这种观点的提出当是受了“竹林七贤”的影响：他们的不仕原因是明确的，尤其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提出“七不堪”“二不可”，明确不与司马氏为官，显然出于对前朝的追念不舍而产生抵触。嵇康一生境遇与稍晚的陶渊明后半生颇有相似之处，这成为诸家误解陶渊明心志的重要线索：

首先，二人都拒招授于千里之外。嵇康为躲避大将军的礼聘耗费体力远走河东郡，司隶校尉钟会的盛情造访也遭遇冷言冷语。退隐后的陶渊明更为敏感，受招为“著作佐郎”不就还显得正常，时人王弘欲得一见，只因身居刺史，被陶渊明请了闭门羹，只能趁陶在游玩“于半道栗里邀

之。”^[8]事后证明二人相处还算愉快，陶在给友人的诗中还道出“相知何必旧”的欢叹。其次，嵇、陶二人平时所务主业，一锻一耕。《晋书·嵇康传》中有载“康居贫，尝与向秀共锻大树之下，以自赡给。”^[9]陶渊明的躬耕更是有自为诗词记载，“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经典耕作画景即是美证。锻匠和耕叟，都是乡间小业，二人的生活都不足裕。最重要的是琴乐了，嵇康是善琴的，有“嵇氏四弄”时人传习，临终广陵散更得“太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为师”^[10]。陶渊明好琴也是有记载的，虽不得乐道却“畜素琴一张，无弦，”也常和酒“挽弄以寄其意”。如此看来二人的生活方式不仅相近，志向所趋也似有相通之处，不通乐理的陶好琴的习惯也更像是向善琴前辈的思慕，这就不由世人不将二人相互联系了。

但陶心中所念与嵇康其实是不同的，在同时提及琴和志的诗作中有“清琴横床，浊酒半壶。黄唐莫逮，慨独在余”之句，可见陶的心思远在黄唐，他的无弦横琴所追慕的当是姜太公的无丝钓杆，与嵇康并无太大关联。所以若说陶以琴明志，则此琴所明之志所向唐尧，与嵇康弄琴自是异曲，亦非同工。陶渊明并不想如嵇康一般，虽然嵇的为人“岩岩若孤松之独立”^[10]、虽然二人都鄙越名教，不仕乱朝，但与嵇康一任自然，讲求“服食养身”相比，陶心中印刻的“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的忧世情结和“黄唐莫逮，慨独在余”的时运之感总在心中纠结不散，构出一幅“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理想社会图卷。如清人马璞在评论陶的诗作《拟古》时所说“陶渊明念及黄农，即宋不篡晋而终身晋世，岂能为晋所用乎？”所以与长沙公浔阳相遇，陶渊明只能“感彼行路，眷然踌躇。”在“三英不逮”的乱世，在“无人信高洁”的仕隐之间，他选择了最艰难的一条路：身处江湖而心忧其民。即使是在天下离乱、朝野失纲的时局之下，对天下苍生的关怀依然是陶渊明无法放弃的心念。陶渊明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对时局有着清醒的认识，数次仕宦经历使得他了解在当时境况下居高位并不能造福于民。因此他的济世情怀并不与入仕密不可分，陶渊明的归田并不意味着逃逸世事，也与心向前朝没有瓜葛。

(二) 贫瘠境况里的“贞刚”之质 游览经历中的“忘天”之趣

笃定不仕，生活仍需继续，桑田隐忍的日子是艰难的。于生活上虽有而立续弦的翟氏帮陶渊明操劳家务，但苦于膝下颇有子嗣，他在养家糊口的问题上压力巨大。作为家庭的支柱，陶渊明需要努力让整个家庭生活正常进行下去。向上的

心态使他时时自勉“民生在勤，勤则不匮。”，但忧念天下的陶渊明心里挂记的并非田园之事，所以体力上的勤恳并没有改变不谙农桑之道的劳作状况。虽然一任自己终日不歇的“执杖而耘耔”，仍每每落得“儋石不储，饥寒交至”，落魄时直至“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的乞食经历。但伟人总能把艰难险途走出不一样的风采，即使被生活压向深渊，陶渊明的精神也一直坚挺，始终没有倒下。

灾难在陶渊明晚年生活中时有发生。陶离群索居，本为寻求清静，一场意外火灾却前来凑趣，他的草庐被尽数焚毁。面对这样的打击，陶渊明写下《戊申岁六月中遇火》。困苦现实里的灾难不但没能扰乱陶渊明的内心，反而成为他抒发情志的引子。陶渊明在前半部分平淡地叙述过火灾状况后，对自己过去生活经历和心路历程进行了回味。四十余年的固守真纯在此处进行了一次爆发式的短暂显露，诗人毫不遮掩地对上古帝王“东户”时代的淳朴民风进行了怀念，并借机抒怀，卓然道出“贞刚自有质，玉石乃非坚”。陶渊明的精神一直没有垮掉，生存已是堪忧的他在读《山海经》时思及被天帝断首仍不罢弃抗争的刑天，以之为发言人，表明自己“猛志固常在”。

仕途的险恶和归隐的艰苦都没能动摇他一颗拳拳赤子之心，陶渊明是伟大的，但伟大并不止于混乱纷扰中的纯粹肃穆，也在于贫苦挤压下的纯真欢趣。

游目骋怀是当时盛行的一种遣心方式，游览山水对于放空心境是很有用的，在压抑混乱的政治环境下自然成了众多文士的选择。陶渊明也未能“免俗”，常常携友登山涉川，骋怀游乐。在《游斜川》中就有“提壶接宾侣，饮满更献酬”^[1]的述写。陶渊明生活的大部分是困苦的，所以他的心境多是沉重的，游览作为陶渊明摆脱这种病态心境的主要方式之一，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他暂时摆脱了困顿生活中的孤苦之感。

陶的家乡在浔阳柴桑，也是他归隐后的常居地，这里的美景为诗人的游览活动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唐权德舆有诗赞浔阳的美景“九派浔阳郡，分明似画图。秋光连瀑布，积翠辨香炉。”的确，浔阳郡从南望北可谓风光不断、随步成画：庐山“万古青濛濛”，五老对坐，神趣天然；兼得香炉飞瀑紫烟悠悠，泉溪之内定是水石相激，声色可人；青林秀木之间自然不乏鸟鸣嚶嚶，花香裊裊。东南远瞰，鄱阳澹澹水波四时不绝，不说节令性的“雁阵惊寒”，但看每日背临暮风的归棹、穿行日边的征帆，也是赏心之事，更不必说北望万古东流的滚滚浪涛了。柴桑就在这不尽山

水怀抱，无穷气象包裹之间。定居此地的诗人“敝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遇见好的天气登高为赋，有好的文章寻人赏玩。闲暇时就披衣相访淳朴农人，无所不谈……身居乱世而隐，能在这样的纯美之境中享受这样的纯真情趣，即便是苦中作乐，也算得上妙极了。

（三）同饮中的真意交通 独酌后的猛志洋溢

与游览一样，陶渊明的饮酒也是件抒真情、享真趣的事。萧统记录了陶渊明任彭泽令时“公田悉令种秫”以得“醉于酒”的行为，沈约也提到他辞归后“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陶渊明是倾心于酒的，事实上，酒的醇香一直与真纯一起，弥漫在陶渊明心灵世界的每个角落，他自己就说“平生不止酒，止酒情无喜。”由此更为明确陶渊明的酒更有酒外之一番情趣，依照他的自陈“试酌百情远，重觞忽忘天”可知很多时候陶渊明饮酒是为了远离现实的纷乱凋蔽，在心中寻找真纯世界的真情趣。酒成为陶渊明寻找真纯世界的一扇门。

与朋友同游是件赏心的事，与知音同饮更是如此。酣饮中萌发的趣味是一定要与知己共享才真正能畅怀怡情的，分享的方式的不同更会让酒中情趣产生不同的滋味。音乐是其中一个独特的方式。陶有无弦琴一张，虽然不精宫徵，但的确是喜爱音律的，这一爱好也不时出现在陶饮乐的诗作中，如“清歌散新声，绿酒开芳颜。”^[6]酣饮过程中情志的产生是不知不觉的，以清乐相伴而饮的情趣不是世人皆有。当诗人“歌以咏志”，抒发心中情怀，唱和的旋律便不单单是乐律，更带有了情志里真醇的味道；而与庞通分享的方式是文章无疑了，诗人回忆游览中途宴饮所乐写道：“谈谐无俗调，所说圣人篇。”诗末感叹“情通万里外”更见得诗人对此中真情的珍惜，欢饮时较为松弛的心境是灵感迸发的绝佳状态，这种状态下提出对文章理法的看法定是难得的真知灼见。这让文章的赠答内容更为珍贵，也更具知音之间别样的真厚情谊。

除了与现实中友人饮时畅谈分享自己心中真意，陶还经常在饮后追慕先贤，与书中的人物乃至灵怪神交，移情抒怀。《读山海经》是典型作品：初始几节诗人明确将酒再三提出以之为抒志灵引，从读前的“欢言酌春酒”到兴起不能罢的“高酣发新谣”，独酌后的猛志喷发从人间延伸向灵怪世界，对夸父、精卫、刑天分别进行赞颂，最后回归人世，冲出“幽居自得”的心境，归落真纯，借大禹和姜太公济苍生的功绩道出心中关怀天下之志。酒像一股洪流，将陶内心的混沌的现实搅开一道通向上古真纯的缝隙；此外，酒后

的陶还常对过去的自己进行回望、反思，《饮酒》中“徘徊无定止”以失群之鸟自喻愧于旧日过失，并在结尾明言“托身已得所，千载不复违。”^[6]回想仕宦生涯的混沌后，陶渊明寻找到自己心灵的最终宿处，即几十年始终不变的真纯信念：即便没有机会出力解救苦难中的苍生，也不会放开对天下的挂念。酒成为陶映照自己心灵的一面镜子，让他以纯真的自己反观旧日沾染的尘世污浊。

陶渊明的真纯情趣并非干瘪的游赏饮乐：他心忧天下故而不轻生弃世以求早日解脱，在解印归田的耕作生活中他又并不失去生命活泼的本色，他志向黄农、心系天下的灵魂在被迫于时世的沉潜中显出高扬于世外的肃穆，成为一枝供无数后人瞻望的铁骨素梅，芬芳满溢。

三、逆流矗立的真立场

魏晋自由思想洪流对后世的波及，使得陶渊明生活的时代文化气氛在佛老的灌注下显得格外活跃。稳厚儒礼思想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显得单薄起来，也让许多文士不愿把陶渊明这个重要的时代文化符号标注在这个范围内。事实上，家族孔业的滋养和江表浓厚儒学风尚的浸润，确实让陶渊明的思想自然地在儒家思想的土壤中形成、生长起来。在给后世留下的财富里，陶渊明心忧天下的情怀像一枚不死的种子，在无数迷茫士子心中长出一株株遮挡风雨的精神乔木，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安稳的精神归宿。

（一）不拘学派的哲士与思想解放的产儿

陶渊明的思想归属于哪个系统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宋许顛说“‘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是此老悟道处”。认为陶渊明的思想是道家学派的支流。施德操在《北窗灸輶录四则》中载正夫语“达摩未西来，渊明蚤会禅。”显然把陶渊明的思想流派归入佛家近亲。朱光潜先生干脆一语化开问题争端“陶渊明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却不是一个拘守系统的思想家。”却又以陶诗中的“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认为“他（陶）的意识或下意识中有一点佛家学说的种子。”^[11]对一个人思想的归流通常是以同时代思想流派为基准的，以上各观点的形成也是如此，对魏晋时期的思想潮流进行分流后把陶渊明的思想划入其中。这样的办法似乎合理，但并不十分科学。

与两汉截然不同，魏晋是兵家征伐、政局腐糜的时代，主流思想自然也有不同的特点。为求保身，不仅流落山野的高士如竹林七贤超然物外，连当朝宰辅王导、谢安也无不俊逸通脱以示清静，这样的文化氛围应当源自儒理体系在汉末的溃乱。建安七子中最年长的一位是未能与其他六人一道

在曹氏文学集团与曹子建共分天下才情的，因为他多嘴的坏毛病惹怒了当权。紧接着的一个文学时期——正始的基调就变得靡弱不堪，无人涉笔现世了。清谈就此登台，老庄玄风从大汉随各家同被罢黜的学术朝野雄起，蔚然成风。从儒家的治世政治观到名教制世理念的陡然转变，四方英才的生存关注点大多从世事转向了自己，名士之间的风度品评风靡各地，更有人为之行书立传，传诵天下，供人仰敬。

然而在朝廷对品评人物未置异词的情况下，一些名士开始超越潇洒走向狂颠了。如刘伶赤身示人尚自以为荣，这样的行为已属不易忍受。何晏以当朝重臣的身份公然为“五石散”代言，导致很多时人纷纷效仿并“扞虱而谈”，自然要被杀鸡儆猴了。可怜嵇康不明此道，步了后尘。鲁迅先生说“加夏侯玄在内吃药的三个都被杀，只喝酒的阮籍混过去了，”只有清谈是被默许甚至提倡的，若许多落魄士子撑得到简文帝之后，他们的生活或许就不必那么寒酸了。简文帝时不说许多文士赖清谈以得闻达，王、谢那样的将军最初踏入仕途也和清谈高名密不可分。同时，刘宋之际鸠摩罗什入自天竺，佛理系统逐渐完备，为说无谈玄的士坛吹入了一股清新之气，也为中国后世哲学界儒释道合一的局面打下根基。当时已有道徒修佛的现象，张融对门生的告诫里就有“汝可专尊于佛迹，无悔于道本”（《弘明集·卷六》）。

主流学术渐渐从大汉王朝积极入仕的儒学向佛老转化成为魏晋的时代思潮特点。也无怪不少后人以陶渊明诗文中有“抱朴”“守拙”“真意”将其划入道统或佛门。其实陶渊明的田园躬耕行迹并非意图“坐忘”，也与“会禅”关系不大，而正与看似相悖的儒礼思想密切相关。

（二）佛老汪海中的儒学高原 没落门第下的礼教传统

每个时代的横断面都有或多或少的异类元素点缀，思想上尤其如此，陶渊明生存的时代也不例外。在佛老盛行的魏晋之际，荆江一代的儒风与周围的文化氛围截然有别，统领荆州的刘表对儒家思想的尊重是当时少有的。《后汉书》载张济在败往南阳途中欲攻取刘表，“中飞矢而死”（《后汉书·刘表传》）。“表曰：‘济以穷来，主人无礼，至于交锋，此非牧意。’”拒不接受荆州官僚的祝贺，其于儒礼的重视可见一斑。刘表领荆州牧之后“遂起立学校，博求儒术”“撰立《五经》章句，谓之后定，爱民养士。”^[12]在一州之长的策领之下，荆州的儒文化自然非同一般的浓厚，而浔阳正在这范围之内。在丰厚儒学营养的浸润下，陶的成长自然也朝着儒家的积极入世

思想进发，陶在晚年回顾少壮心事时就提到年少游览对六经的喜好和因此产生的“猛志逸四海”，这与地方儒礼风气自然密不可分。

陶的家族对儒学思想的教育更是对陶内心思想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陶渊明的家族三代仕宦，虽然家境日不如前，但门风尚存，世代相传的儒家思想成为陶渊明血脉里律动的一部分。

曾祖父陶侃是陶渊明景仰的一位先祖，不论是与亲友交往中提及的“与余为宗族，同出大司马”赫赫功位，还是对后代的教诲中追溯起“抚剑风迈，显兹武功”的灼灼风采，都饱含着他对陶侃的追慕之情、向往之意。而陶侃的积极入仕情怀是颇为可谈的。《晋书·陶侃传》一开始就记录了他少穷时对入仕建功的热情：为得当时孝廉范逵的举荐，逵在陶家作客离开时，“侃追送百余里。”在范逵问及“卿欲仕乎”时，他毫不避讳地说出“欲之，困于无津耳！”他以大禹为自己的行为精神榜样“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并认为“老庄浮华，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以此为准则要求部下僚属。可见陶侃是一心于儒学思想的，不仅个人功勋卓著，万古流芳，在言传身教之下，他膝下十七子有九人都名垂青史。从陶渊明在《命子》篇对陶侃的回顾和赞颂中可见陶渊明对曾祖父的景仰和陶侃对他个人的巨大影响。

但对陶渊明性格发展形成起决定作用的，应是他的外祖父孟嘉。陶渊明少时丧父，寄居外祖父家。孟嘉作为生活中最亲近的长辈，对他成长过程中性格和思想的定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个人认为他的入仕经历所任参军之职颇受孟嘉于温桓幕府任参军的影响，而“性嗜酒”更和孟嘉“好酣饮”更是有莫大的关系，只是陶渊明“饮少辄醉”与孟嘉的“愈多不乱”不甚相近。在为孟嘉所作传记《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中，“冲默有雅量”“温雅平旷”“色和而正”的性格描述不仅是对孟嘉的仰慕，更是对自己的要求。《五柳先生传》中陶对自己“闲静少言，不慕容利”的叙述显然有孟嘉的影子。据《晋书·孟嘉传》记载，“嘉少知名，”江州太尉庾亮称赞“孟嘉故是盛德人。”德行，自然是儒礼的范畴，孟嘉以之少时闻名，可知其对儒学的信仰和遵守。而陶渊明自小在孟嘉门下成长，耳濡目染之间定受到了孟嘉的良好导引。

（三）坚定不移的儒礼倾向 别开一流的儒学分支

受时代主流思想的影响，有学者以陶诗中出现的“守拙”“抱朴”“真意”等字眼认为陶渊明的思想里有道家或是佛门的影子。一个人的思想

倾向是很有可能受时代主流学术感染的，但以诗作中的时代影像去判断这个人的内心世界未免过于草率。

一个人内里情志所向应该从他的所学和受之影响的个人生活经历去判断。表面沾染的时代颜色当然无法推测出一个人心灵深处的东西，陶渊明“守拙归园田”后的躬耕生活和其中“乐夫天命复奚疑”^[6]的游乐之趣、饮乐之情，至多只能算是本真济世情志难申的状态下于现实的无奈“偷欢”而已。他从未放弃对离乱中苍生的挂念、对苦难里天下的执着。朱自清先生由陶渊明诗中两现“道丧向千载”经过层层断章考证将他的思想定格于“实在还是道家”（《陶诗的深度》），认为陶诗中出现的“真”“淳”是“孔子学说的道家化”（《陶诗的深度》）。这两次“道丧向千载”的出现分别在《饮酒》和《示周继祖谢》中。《饮酒》中第三节首句“道丧向千载，人人惜其情。”诗人所言“道丧”是为引出天下有识之人所惜“其情”，由语境知“其情”所指当在前章某处，第二节末的“不赖固穷节，百世当谁传”，显然与《论语·述而》中“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无穷”所示的“固穷”思想一脉相承，而《示周继祖谢》中“道丧向千载，今朝复斯闻。”前句指明“周生述孔业，祖谢响然臻。”其中的“孔业”足以见得陶内里的情志所向。陶渊明不是完全没有沾染时代的影子，他的诗作中的确有“返自然”“乐夫天命”“抱朴含真”等当时流行的词语和表述方式，但他的内心始终是坚定不移地向着儒家思想的。陶渊明一生执著着的，一直是儒家“忧道不忧贫”的坚定情操和“三不朽”的价值体系。

结语

陶渊明的卓然是众家共见的，洪迈赞扬他“高简闲靖，为晋、宋第一辈人。”萧统也称述其“大贤笃志，与道汗隆。”不少因陶渊明的归隐经历对他产生的误解中指出他是不染尘俗的世外高人。纵观陶渊明一生，少时贫弊经历的“东游西走”并未让他滞留偏安朝堂、沉沦混乱官场，晚年隐于乱世遭遇的“风雨纵横”也没能让他向现实妥协、放弃对天下的关忧：陶渊明一直没有与现实脱节，他的田园生活不是对时事的逃避。虽然时常与友人“乐琴书以消忧”，但从未放弃对济世之志的执着，“总发抱孤介，奄出四十年”的豪言壮语足见他数十年志向之坚定不移。陶渊明不像稍前的魏晋隐者归居山林不问世事，他的游览山水中包含着对先祖安天下功绩的向往，饮酒赋诗中充满了对先贤济苍生情怀的追念。也有人因

为陶渊明作品中的“抱朴”“含真”认为陶的思想归于当时思潮的某一支。陶渊明宦海的数年辗转使他与现世确实有过极为紧密的接触，所以即使涉及情怀展示的作品中也不免嗅得到一些当世的气息。部分作品中有道家学说的影子或是佛理系统的片段，但他并未陷入晋宋的靡乱世风、随波逐流。陶渊明在世代相传的礼教泉眼里浸润着成人，又在荆江这片远离佛老的儒家文化高原上逐渐成长，数次起落之后一颗坚定的儒心最终形成，他对“孔业”的执着并没有受当时思维的影响而有所改变，反而在与佛老思想的错身而过中更加稳固。或许这一思想涓流因为与周围的时代堤岸显得格格不入而受到一些质疑，但它的真实内质散发出的贞刚力量流传久远并不断累叠，成为一尊不朽的儒家济世思想雕塑，给后世无数身处离乱逆境中的文人士子强劲的精神支撑。

参考文献：

- [1] 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史教研室. 陶渊明资料汇编（上）[C]. 北京：中华书局，1962.4.
- [2] 鲁迅. 鲁迅全集第三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501.
- [3] 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史教研室. 陶渊明资料汇编（下）[C]. 北京：中华书局，1962.4.
- [4] (梁) 钟嵘著，周振甫译注. 诗品译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98.66.
- [5] (隋) 王通著，阮逸译注. 孔子集语[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43.
- [6] (晋) 陶渊明注，龚斌校笺. 陶渊明集校笺[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13.
- [7] (唐) 王维著，赵殿成笺注. 王右丞集笺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334.
- [8] (梁) 沈约著. 宋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4.1257.
- [9] (唐) 房玄龄. 晋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4.1768.
- [10] (南朝宋) 刘义庆著，毛德富、段书伟译. 世说新语[M].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131.
- [11] 朱光潜. 诗论[M]. 北京：北京出版社，2014.302.
- [12] (南朝宋) 范晔撰. 后汉书[M].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1380

(责任编辑 秦川)